

勇於追求，忠於自己的呂碧霞女士

述口整理
呂碧霞
林秀美

光復後，從中國來了一些女教授，她們受過高等教育，態度雍容大方；

日本時代，女性說話總要退一步，輕聲細語的；

兩者完全不同，對比鮮明，

這點感受最深。

師生結緣 五十年往事成趣談

從公學校畢業後，進入靜修女中就讀，我從小愛打乒乓，是學校乒乓球校隊的成員，常常在課餘去打球，和文政學部文學科外文系教授工藤好美因此而結識。畢業後，他問我要不要來帝大工作，引薦我至政學科中村哲教授的研究室，為中村哲及中井淳兩位先生整理書籍的分類卡片、管理圖書，有餘也幫忙整理辦公室，名銜是打字員，工作內容實與助理類似。中井先生是法律哲學講座教授，已過世多年，而中村先生是憲法講座教授，戰後返日，被選為參議院議員。（註一）

帝大教授的研究室都附設有圖書室，教授可依研究

講學的需要自行添購書籍，並且自行保管，藏書極為豐富，學生向老師借書也很方便，光復後這些書則集中收入各系所圖書館。

中村先生卅歲就當上教授，年輕有為。有一次，為了我自行整理他書桌的事，對我大發雷霆，每次想起這件事，就覺得很冤。我只是看他書桌凌亂，出於好意幫忙整理，結果挨罵，他是老師，我也不好回話，只有默默承受，心裏卻不是滋味。後來《青榕會會報》邀稿，要我寫一篇關於帝大生活的回憶，我就寫了一篇短文將這件事傾吐出來，沒想到他看到了文章，竟親筆回信給我，署名之外還加蓋印章，頗為慎重其事。他在信裏說道，雖事隔半世紀，然而看了我這篇文章，當年桌上的樣貌恍如就在眼前，曾經有一位女記者也說過他桌上亂七八糟之類的話，他讀著讀著就覺得想笑。

光復之初，由於中國方面的行政人員還沒到校，所以我被派支援薪水支付的事務，之後再轉任歷史系圖書室，工作內容和帝大時期差不多，於民國六十五年退

休，前後算起來，在台大服務也有卅五年。

環境驟變 男女有別感受良深

由於早年所受日本教育並未談及中國事務，對中國完全不瞭解，當年對於即將來台的中國政府，心情是既志忒又好奇。畢竟文化有異，台灣的社會環境隨著日本人撤退，中國政府移駐而變換，其中言語不通、觀念和生活習慣不同影響最直接。

語言問題首當其衝。我不會說寫中文，但是工作上需要，實際生活也不可缺，所以開始學習國語，那時我們向中文系一位助教裴溥言小姐（註二）求教，她為人熱誠又有耐心，我們跟著她像個小學生一樣，從夕夕口學起。

女性社會地位的提昇則是令我感受最深。日本社會男性至上，對女性則是客氣有餘，尊重不足，女性說話總要退一步、輕聲細語的，在這樣的社會規範制約下，你也只好乖乖地不求表現；光復後，從中國來了一些女教授，她們受過高等教育，態度雍容大方；兩者完全不同，對比鮮明。

日本時代女子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不多，當年女生能唸到高中學校就已經不錯了，一個庄頭有一兩個是很稀罕的事。公學校之後的女子學校就只有第一女中、第二女中及靜修女中等三所，教學內容都相差無幾，不出日本歷史、英語、插花、唱歌、作法（奉茶、講話等儀節）及和裁等。大部分的課每週一小時，英語為四小時，而「和裁」課最

重有五小時，和裁即和服裁縫，我最不喜歡。一二年級時全部的課都要上，三四年級依專攻主科不同分為和裁與英文兩組。課程輕鬆，考試容易，不過所學有限，進入社會工作就不盡然夠用；所以說那時候的女子都很「憨」，因為根本沒讀多少書。如果要繼續升學，則必須遠赴日本唸專科學校，一般台灣的女孩子很少再深造，極少數能像杜純子和林素琴（註三）兩位唸到大學畢業。許多有錢人家會讓女兒在高女畢業後去唸「花嫁」學校，即新娘學校，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，等著嫁人，很閒氣（無聊）！

除了能力，家境要很好才能負擔昂貴的學費。我記得公學校一學期學費六角，尚稱便宜，但公立高女十元，私立十五元，再加上每月車資約需五元，當時作工一個月工資才十五元，所以只有地主和薪水夠高的公務員才有辦法支付。

光復後，教育普及，參與社會的人口增加，工作職場的表現突出等；種種轉變，讓女性逐漸從傳統束縛中得到解脫，身為女人感覺輕鬆不少。

自在生活 不婚是無悔的選擇

呂家是世居中和南勢角的大家族，我有幸生在呂家，家庭有餘裕，父母作人開通，得以接受教育，過自己想過的日子。工作所得均自己花用，因此存了些錢，在民國四十年買下這塊地，蓋房子、出租，退休後不必為生計操煩。

不婚在當時社會也許少見，不過我



個人倒很自然。我母親卅幾歲就當寡婦，對於婚姻沒有任何期待，所以並未反對我不婚，事實上她最希望我永遠陪伴她；而我覺得做名職業婦女，經濟獨立，加上自由自在慣了，所以選擇單身生活。結婚與否和幸福並非正相關，完全是個人主觀，我現在孫子一大堆，也是熱鬧得很。



△帝大師生1930年於中正紀念堂合影。右起：石田千三、妹、石田千三（外文系學生）、呂碧霞、蔣內健次千金、蔣內健次（南洋史教授）、鐵田行長（青榕會事務局長）、史學系學生（姓名不詳）。（呂碧霞提供）

隨著年華消逝，當年意氣風發的央學生，如今都是遲暮老人，或許是共同走過這一段不算短的日子罷！彼此間的情誼益形彌堅！

註釋

註一：憲法講座自昭和三年（1928）起設置，中村哲原為助教授，昭和十一年開始擔任講座，於第二年升任

退休後的生活忙碌而愉快。多年來，因著機緣，協助天理教會友們來台宣教事工，一年要去日本四、五趟之多。加入青榕會（帝大文政學部校友會）則是始於十多年前，一次在日本參加天理教活動時受到邀請，後來也引介柯環月小姐、曹永和先生和宋文薰先生等人參加。前事務局長（總幹事）織田行長先生熱心會務，做事精明幹練，尤其經過這麼多年，還能將會員的通訊資料整理得如此確實而完整，十分不容易，不過在他去世之後，會務乏人照料，青榕會的組織運作已不若過去。

即使如此，我和許多帝大校友交誼甚篤，彼此常書信往來，這次去美國，即是赴老校友劉茂本（註四）的邀約。我和杜小姐在帝大時並不熟識，她看了我在會報上的文章以後，主動與我聯繫，兩人一見如故，相談甚歡，從此結為摯交。

教授，繼續擔任憲法講座直到昭和十八年。中井淳教授則自昭和十三年至十八年間，擔任法律哲學講座。參陳昭如等著〈文政學部——政學科簡介〉，《台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》創刊號，1996，台灣大學台灣研究社。

註二：裴女士後為中文系教授，民國八十年退休。

註三：兩人均為帝大畢業校友。杜純子女士為昭和十九年（1944）文學科畢業，主修英文，長年旅居美國。林素琴女士為昭和廿年哲學科畢業。

註四：劉茂本先生為昭和十八年（1943）政學科入學生，曾任母校法律顧問，原為台灣青榕會總幹事，後移居美國，與王江村會長失去聯絡多年，未料於此次訪談中得知音訊，實屬意外收穫。